

元末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



赵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元末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

赵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末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与文学研究 / 赵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5926 - 2

I. ①元… II. ①赵… III. ①政治文化 - 研究 - 中国 - 元代②政治文化 - 研究 - 中国 - 明代③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元代④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明代 IV. ①D691②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781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李楠
责任印制 何艳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361 千字
定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言 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述评	(1)
第一章 黄溍“羽翼圣学”的文道观念	(43)
第二章 宋濂辨儒	(72)
第三章 道与文犹形影：宋濂的文学思想	(94)
第四章 道与文不相离：王祿的政治思想与文学观念	(123)
第五章 坚守正统：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一）	(176)
第六章 惟道之趋：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二）	(205)
第七章 有志于道：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三）	(232)
第八章 方孝孺“道”论的三个层面	(260)
第九章 以道事君的典范	(285)
第十章 文章由来关政教，道术何曾间今古 ——方孝孺“道明而辞达”的文学观念	(307)
第十一章 “洗濯襟灵”：求真的文学思想	(323)
参考文献	(349)
后记	(358)

前言 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述评

—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评论明初的文学说：“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祿、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就是说，明初的文学是以“讲贯”元代道学、文学之风而使其学有“本原”，文以宋濂、王祿和方孝孺为代表，他们与元后期的虞集、柳贯、黄溍、吴莱等人相为师友，学有传承。这段话反映出明初与元后期的文风和文学观念的一致性和相承性。

《明史》上述所列举的这些文人中，以宋濂、王祿、方孝孺为代表的文人直接传承了元末黄溍、吴莱等人的文道思想，且在明初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将这种文道思想延承下来。这些文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应当是宋濂。宋濂在元末时已经享有了很高的声誉，入明后，他深受朱元璋信任，被推许为开国文臣之首：“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①当然，朱元璋对宋濂“开国文臣之首”并不是完全从文学成就上来说，也包含了宋濂在朱元璋平定天下中所立下的功劳在内。

在明初，深受朱元璋器重且文章同样卓越的还有刘基，《明史》刘

^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87页。

基本传中说：“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①刘基在诗文方面的成就颇高，尤其是寓言文方面，代表作《郁离子》历来很受重视，说他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或者“公之文章与功业并传无斁，恢恢乎有余芳矣”^②的评论完全是无愧的。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刘基被重视首先是因为他的谋略和在明朝统一中所立下的功业，朱元璋称其为“吾子房”，以及《明史》本传中称其为“诸葛孔明俦也”，就是很好的说明。

宋濂与刘基相比，受称道的首是文学，其所为朱元璋和明朝廷的服务也往往是以文辞为主，他曾对朱元璋说：“臣少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事上，一旦受职任事不效，负陛下。”^③就是说宋濂不愿意担任官职来处理具体的朝廷政务，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在文辞方面。宋濂在元末时已经“以文章名海内”，入明后不仅继续写作了大量的诗文，成为“开国文臣之首”，同时更是“开明代文章之派”^④。刘基对宋濂的文章推崇备至，说：“先生结庐在其下，文追班扬兼贾马。”^⑤他在为宋濂文集作的序中，推宋濂为明代开国文章之首：“儒林清议，金谓开国词臣当推为文章之首，诚无间言也。”^⑥宋濂自己在文章中记录刘基对朱元璋说的一段话：“濂之友御史中丞刘基伯温，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强书生自命。一日侍上于谨身殿，偶以文学之臣为问，伯温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让。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气烨然。’”^⑦虽然与宋濂并为一代文宗，刘基还是将宋濂推举为“当今文章第一”，自己“不敢他有所让”地列为第二。

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第3782页。

② 谢廷杰：《诚意伯文集序》，《诚意伯文集》卷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影印《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

③ 《潜溪录》卷二，载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4页。本书所引宋濂的文献，若非有特殊说明，皆引自《宋濂全集》。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七《渊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提要。

⑤ 《潜溪图歌为宋景濂赋》，《诚意伯文集》卷十六，第417页。

⑥ 《宋景濂学士文集序》，《诚意伯文集》卷十，第269页。

⑦ 《跋张孟兼文稿序后》，《芝园前集》卷一，第1161页。

宋濂除了以文章著称之外，也是明初最为著名的理学家之一，“自命儒者”^①，他的理学思想和道学观念在明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濂的理学传承可以上溯到朱熹，被全祖望看作是朱熹的“世嫡”：“文宪之学，受之其乡黄文献公、柳文肃公、渊颖先生吴莱、凝熙先生闻人梦吉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之递传，上溯勉斋，以为徽公世嫡。”^② 根据全祖望的这个说法，宋濂的学术主要得自闻人梦吉、柳贯、黄潛和吴莱，《儒林宗派》和《宋元学案》中都将宋濂既列为柳贯门人，又列为黄潛门人，实际上他得益于黄潛最多。宋濂在理学上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有一个名闻天下的被称为“读书种子”的门人方孝孺。从《明史》儒林传所列的明初理学家来看，方孝孺是很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万斯同在《儒林宗派》中，将方孝孺列为宋濂门人。方孝孺因为坚决不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被杀，全祖望在评价宋濂之学“渐流于佞佛”后说：“犹幸方文正公为公高弟，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几几乎可以复振徽公之绪，惜其以凶终。”^③ 方孝孺的文章亦颇受称道，宋濂在序中称赞其文章说：“见于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滚滚滔滔，未始有竭也。”^④

由此可见，宋濂在明初的道学和文学两方面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他无论在道学还是文学上都上承黄潛下开方孝孺，甚至对整个明代都产生了影响，如全祖望所评论：“公以开国巨公，首倡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故尤有苍浑肃穆之神，旁魄于行墨之间，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与！”在《儒林宗派》卷十三中，在柳贯条下列宋濂，在宋濂条下列方孝孺，意为柳贯—宋濂—方孝孺的传承，但正如上文所说，宋濂得益于黄潛为更多，所以黄潛—宋濂—方孝孺的传承要更为合理一些，明人张俭提到黄潛的后嗣说：“公（黄潛）之学，一传而得宋公潜溪、王公华川，再传而方公逊志。宋以文显，王、方以忠节著，炳炳为世名臣，咸大裨于治教。其源流，盖可见矣，岂特文辞云乎？”^⑤ 据此，可以说

①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第3784页。

② 《宋文宪公画像记》，《宋元学案》卷八十二，第2801页。

③ 同上。

④ 《送方生还宁海》，《芝园续集》卷十，第1626页。

⑤ 《黄潛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50页。

黄溍—宋濂—方孝孺这一传承是元末明初道学和文学最为重要的主线之一。

这条主线中，最重视的首先是道学，黄溍提出为学要“羽翼圣学”，宋濂提出“任道为宗”，方孝孺更提出“惟道是趋”。他们认为，无论皇帝还是臣子，都要按“道”而行，臣子不仅自己要守“道”尊“道”卫“道”，更要致君行“道”。这是他们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反映。如果说宋濂对于“道”的践行还不是特别坚决、有明哲保身的考虑在，那么方孝孺则是用“十族”之命维护了“道”。方孝孺被诛十族，给明代文人士大夫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但是，方孝孺的节义在明代并没有成为绝唱，而是为文人士大夫所继承。明代中后期，为“道”而殉身的文人士大夫前赴后继，为明代政治文化留下了血色的悲壮。方孝孺对于“道”的追求和坚持，为明代的政治文化树立和奠定了基调，方孝孺与继承者们一起，抒写了明代忠贞士大夫的壮丽悲歌，使明代在求“道”方面成为一个与周比肩的时代，如明人王弘海在《方正学先生祠堂碑》中所云：“今天下知与不知，皆谓先生之节，文皇帝成之矣……尚论千古君臣之际，我明与成周实异代比隆云。”^①与周“异代比隆”的评价，是对明初士大夫持“道”精神的一种极大的褒扬，若方孝孺能见到这样的褒扬，应当会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黄溍、宋濂和方孝孺以“道”为准，指出文要明道，文乃道之所发。所以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学文章就是学道，“以临大政则断，以处富贵则固，以行贫贱则乐，以居患难则安，穷足以为来世法，达足以为生民准，岂特学其文章而已乎？”^②故，除却道则无文。不过，他们也指出，道还是要文来言明，如王祹《送胡先生序》中说：“其为道，皆著于文也，其文皆所以载道也。”^③文要载道，而道也要通过“著于文”的方式表达出来。

根据上面的分析来看，从元末到明初的文学，确实存在着黄溍—宋

① 《天池草重编》卷九，康熙刻本。

② 《经畬堂记》，《朝京稿》卷二，第1671页。

③ 《王忠文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濂一方孝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开篇即说：“朱元璋……一方面重视人才，一方面又严刑峻法，给士人留出有限的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重政教之用的文学观成为文学思想主流，鲜明地反映在创作和批评中。代表主流文学思想的主要人物是宋濂和他的学生方孝孺。”^① 这条文学思想的主流，表明了明初的文学既是对元末文学的继承，又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强化了文章明道的功用。这种坚持“道”、维护“道”、致君行“道”的思想对明代中后期士人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影响。可以看到的是，明后期的众多士大夫为了维护“道”，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屈服于皇帝不合“道”的行为，前赴后继地为“道”而殉身；并且在“致君行道”的同时，还承担起“觉民行道”的责任。

正如王祎在《送胡先生序》中所说，明初的文学与道学的关系是“文义道学，曷有异乎哉？”^② 这是明初在求“道”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实态，本书就是以黄溍—宋濂—方孝孺这条道学和文学的发展线索来探讨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状态下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

此外，同时师承黄溍、作为宋濂同门的还有王祎。王祎同黄溍和宋濂一样，一生执着于“道”，并且王祎更加强化从“道之用”角度将各家学术加以会通，并从“道之用”出发强调文之用。因此，本书也将王祎的政治思想和文道观念纳入写作范围。

下面，本书首先对明初的政治生态进行说明，并对目前涉及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其次，对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想和文人心态方面的研究加以述评。

二

在中国古代，“士”或“士大夫”阶层一直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士大夫的界定，吴晗说：“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绅士和知

^①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② 《王忠文集》卷五。

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平常，我们讲到士大夫的时候，常常就会想到现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① 阎步克教授经过考察有关“士大夫”的文献史料，认为如果要用现代语言对士大夫的特征做一个最简单化概括的话，可以定义为“官僚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结合”^②。

士大夫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事务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般认为，在唐、宋、元、明、清的科举时代，士大夫政治才进入高度成熟的发展阶段，不过阎步克教授认为，“在经过战国、秦、汉这一历史演进之后，士大夫政治就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特征了”。阎步克教授所撰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对士大夫政治的演生和形成过程加以分析，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而不是其他结果，最终成为演化的定局。该书以士大夫为研究对象，又在第一章中明确说明所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文化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本书所探讨的就是士大夫政治文化。就目前来看，该书是较早研究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著作。

关于政治文化的界定，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第五章“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中有“政治文化概念及其理论界定”部分，详细考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政治文化的种种定义^③。在这些定义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所下的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④ 周齐分析了种种关于政治文化的界定后，认为政治文化的含义有四个方面：（1）政治文化在实质上是特定社会之实际进程的反映；（2）在内涵上几乎可以涵盖一个政治系统中所属政治主观因素的各个

① 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③ 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G. A. 阿尔蒙德、小 G. B. 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方面；(3) 政治文化绝不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指在人们政治行为模式中隐含的文化观念形态与复杂的政治现象相表里；(4) 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后，具有继承性和遗传性。陈苏镇教授在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一书的“前言”中说，所谓“政治文化”定义很多，简单来说，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存在着互动关系^①。

根据中国文化传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学者在参考阿尔蒙德等人关于政治文化定义的前提下，对“政治文化”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解释。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考察了西方学者如阿尔蒙德等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政治文化的定义后，指出自己对于政治文化的界定说：“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虽然也大致包含了阿尔蒙德定义的内容在内，但它更为宽泛，也经常用于指涉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项和问题。做出这种处理，是为了适应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② 因此，阎步克所说的“政治文化”首先“指的是在政治与文化的交界面上所发生的事象”^③。《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的第一章为“问题与前提”，第十一章为“结论与推论”，中间部分的主题内容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讲秦以前士大夫政治的前身及其政治文化传统；第六章至第十章为第二部分，主要讲秦至东汉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迁，以及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过程。

另一部中国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专门著作为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余英时在该书所使用的政治文化含义，与阎步克对于政治文化的界定有相同之处，也有一点相异的地方。余英时从两个方面来解释政治文化，一是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二是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该著中揭示宋代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士大夫形成了和皇帝“同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念，

① 陈苏镇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并将这些理念在政治行动中付诸实践，以及政治斗争由此而呈现出来的特殊色彩。余著以朱熹为中心切入点，探讨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出版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许多著名的学者如陈来、葛兆光、邓小南、杨儒宾、刘述先等，或为之撰写书评，或撰文与著者进行讨论。邓小南阅读本书后，说政治文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读余先生这本书，有很亲切的感觉，也很受启发。政治文化可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角度，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方面。”^①的确如此，本书的出版激起了学界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的热潮，从近十年发表的众多论文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来。

与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相比，关于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对于明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仍局限于传统的领域、思维、视角和方法。现在可见到专门或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余英时的《宋明理学和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是最主要的研究著作，以及载于《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儒家思想与日常生活》三篇文章也提到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由“得君行道”向“移风易俗”的转化。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及一系列论文，有论及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部分内容。周齐的《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第三章“明代宿儒士大夫之儒释观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探讨了部分士大夫对佛教的态度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政治文化观念。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第四章“一般的考察：近世士大夫的生活和意识”中，也有涉及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内容。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二十一章“明代的集权、专制政治思想与‘平等理想’”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化，不过实际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平等政治理想，属于政治文化的范围。彭国翔的《王龙溪的〈中鉴录〉及其思想史意义》的论文，反映了晚明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

^① 邓小南：《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读书》2005年第10期。

被研究者忽视的向度。美国学者墨子刻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从政治文化角度揭示了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作者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个人既具有一种神圣的道德自我力量，又包含了一种害怕道德失败的焦虑，由此造成了所谓的困境意识。宋代以来的儒学形成朱熹代表的学派与王阳明代表的学派的分歧，相比较而言，朱熹想通过参与实际行动来主导政治世界，王阳明则转向下层民众自我觉悟、自我约束的方式来建立社会秩序。

三

本书在对元末明初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与文学进行探讨之前，首先对上述关于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及其相关的）研究的著述和论文做简要的述评，使本书的研究能有更好的针对性。

从实际情况来看，明初的士大夫政治文化状况，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和士大夫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代士大夫的生存状态相当恶劣，因此对明代士大夫的关注，首先是其生存环境的恶劣。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余英时特别强调宋代对待士大夫的宽松的政治气氛，皇帝和士大夫能融洽相处，士大夫也能充分阐述得君行道的政治主张。与宋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态相当恶劣，余英时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六章“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中说：“我们只要将明太祖的作风与宋太祖优容士大夫的情形，特别是‘不杀大臣及言事者’的‘家法’，略一对照，则宋、明两朝政治生态的差异已无所遁形。”^① 通过与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态的比较，就会更加切肤地了解明代士大夫的政治生存处境。

其实，朱元璋在起兵和建立明朝之初，非常重视儒生的作用，这在南炳文、汤纲的《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第三节、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中有较为详

^①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61页。

细的阐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中有“明祖重儒”条，详述朱元璋搜罗儒生的情况，云：“明祖初不知书，而好亲近儒生，商略千古。徐达往取镇江，令访秦从龙，致愿见之意，即令侄文正、甥李文忠以币聘至应天，朝夕过从，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从龙又荐陈遇，遇不受官，而尊宠之，逾于勋戚。后置江南行中书省，省中自李善长、陶安外，又有安思颜、李梦庚、郭景祥、侯元善、杨元杲、阮宏道、孔克仁、王恺、栾凤、夏煜、毛骥、王濂、汪河等，皆燕见无时，敷陈治道。又聘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下婺州后，又召吴沈、许元、叶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等，会食省中，日令三人进讲经史。其后定国家礼制，大祀用陶安，袷禘用詹同，时享用朱升，释奠耕籍用钱用壬，五祀用崔亮，朝会用刘基，祝祭用魏观，军礼用陶凯，一代典礼皆所裁定。寻以胡惟庸谋反，废丞相，又设四辅官，以王本、杜佑、龚、杜、赵民望、吴源等为之，隆以坐论之礼，谏院疑谏，四辅官得封驳。又有安然、李乾、何显周等相继为之。帝尝谓‘听儒生议论，可以开发神智。’盖帝本不知书，而睿哲性成，骤闻经书奥旨，但觉闻所未闻，而以施之实政，遂成百余年清晏之治。正德以前，犹其遗烈也。”^①可见朱元璋对儒生的搜罗之广，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朱元璋基本上把当时的著名儒生搜罗殆尽。朱元璋认识到儒生的议论可以“开发神智”，故与这些儒生之间交谈和相处还是很融洽，《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又有“明祖文义”条说明之：“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识书，然其后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至如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此固其聪明天亶，然亦勤于学问所致。下金华后，聘刘基、宋濂在军中，朝夕讨论，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谒见，即留置幕下，有疑辄问。（至正十三年事）渡江取太平，即召陶安参谋府。（十五年）克集庆，即辟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取镇江，闻秦从龙宿学，即令从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币聘致，常书漆简，问答甚密。又以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十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37—838页。

从龙荐，聘陈遇侍帷幄，呼为先生而不名。（十六年事）取婺州，即辟范祖幹、叶仪、吴沈、许幹、叶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二）人会食省中，分直讲经史。（十七年事）计其时距起兵才数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义已早通贯。”^① 朱元璋起事时目不识书，他的知识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与所搜罗来的儒生之间的交谈。亦如罗宗强对朱元璋的评价说：“他（朱元璋）原本没有文化，征战与治国都离不开文化人的帮助；而其内心深处，又与文化人有着本能的距离。他既有开阔的胸怀，善于接受新知识，从一个没有文化的佃农，到熟知历代兴革、熟知历代战例并能运用自如以指挥作战。他能诗能文，甚至能注《道德经》，知晓声韵。”^② 又说：“他（朱元璋）原本没有文化，但在征战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极善于学习。史称其对经书、史书，对历史上的有名战例，都极为熟识。他常灵活引用经、子、史书的知识于打仗与治国。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也学会写诗写文。”^③ 罗宗强的这两段论述有些前后重复，不过对此的反复论述，说明了朱元璋确实是从一个原本没有文化的人，通过与各种知识分子的交往，变成一个能诗能文、通晓声韵的帝王。在第二次强调时，罗宗强还引述了焦竑《玉堂丛语》中所引《殿阁词林记》中的一段话，云：“圣祖时，凡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虽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盖不特细绎义理而已。洪武末，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④ 从上述所叙述来看，朱元璋与身边的儒士朝夕相处，学习到了文化知识，增进了学术，而且学得了打仗的谋略与治理国家的治术。这些儒士们为朱元璋最终统一全国、建立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如1347年七月，朱元璋打下徽州后，立即拜访城中的著名儒士朱升，朱升为之提出了著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又如宋濂应召而至之后，朱元璋把典章制度等朝廷事务皆委之，推其为开国文臣之首。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二十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二，第738页。

②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7页。

③ 同上书，第27页。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

朱元璋深知儒生的作用，他认为仅凭武将不足以成事，若与文人、儒生相结合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若将武将比作臂膀，儒生则如大脑。余英时认为朱元璋虽深知儒家的纲常对他的统治的作用，但他在内心对儒家并不真正存有敬畏之心：“明太祖深知儒家的纲常对于他的统治具有无上的工具价值，这是不在话下的。但问题在于他究竟对儒家的圣贤是不是真正存有敬畏的意识。”^① 余英时征引的史料中关于“道统”和孟子二事，进行具体分析，最终指出，不仅程朱理学在朱元璋心中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就是对孔子和孟子也没有什么好感，“彻头彻尾是政治运用”^②。考虑到儒生对于平定天下和稳固统治的工具价值，朱元璋在自己重用儒生的同时，严禁部下将官任用：“太祖于国初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容儒者在左右议论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对私自任用儒生的将官加以严惩，如朱文忠在金华时用儒生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等参与军中事务，朱元璋就“差人提取屠性等五人到京，内王祎、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惟屠性、孙履诛之”^③。朱元璋怕部下与文人相结合，担心儒生去开发部下将领们的“神智”，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个事件表明了朱元璋对儒生既爱又怕，更加说明了朱元璋对儒生作用的重视，同时也对儒生充满了忌惮和猜疑。

这种猜忌一直伴随着朱元璋的一生，在战争频繁的时期，这种猜忌表现得不是非常明显，而在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对大臣和文人的猜忌就凸显出来。上引赵翼《廿二史札记》的材料说朱元璋按照儒生的议论施政，取得了明代百年“清晏之治”，这样的评论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一定的史实；但朱元璋对士大夫的猜忌和高压却改变着明代士大夫们近三百年的历史命运。

在建立明王朝之前，朱元璋完全是一副慈祥、仁义的面孔，赵翼曾专设“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之条目，云：“明祖以布衣成帝业，其得力处，总在‘不嗜杀人’一语。初遇李善长，即以汉高豁达大度，不嗜杀人为劝。及取和州，诸将颇不戢，范常规以‘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

①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167页。

② 同上书，第169页。

③ 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地，何以成大事？’即责诸将搜军中所掠妇女，遣送其家。既渡江，将取太平，令李善长预书禁约榜文，入城即悬诸通衢，兵皆肃然，毋敢犯。故陶安谓：‘明公神武不杀，天下不足平也。’及将取镇江，先坐诸将以重罪，令善长再三求释，乃下令庐舍不焚，民无酷掠，方许免罪。于是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池州之役，徐达、常遇春败陈友谅兵，生获三千人，遇春欲尽诛之，徐达不可，乃以闻，而遇春已坑其兵过半，帝急命释之，由是命达尽护诸将。遇春围熊天瑞于赣州，固守不下，帝虑其多杀，先戒曰：‘得地无民亦何益？’乃筑长围，半年始克之。于是诸将皆承顺风旨，咸以杀掠为戒。徐达围张士诚于平江，亦几一年，城将破，先约遇春曰：‘兵入，我营其左，公营其右，禁杀掠。’故城破而民亦晏然。潘元明以杭州降于李文忠，文忠身宿谯楼，兵有借民釜者，立斩以徇。建宁守将达里麻翟、也先不花送降款于何文辉，主将胡美怒其不先诣己，欲屠其城，文辉曰：‘兵至为百姓耳，何可以私意杀人？’美遂止。张彬攻靖江南关，为守城者所诟，怒欲屠其民，杨璟谕之，亦止。邓愈之徇安福也，部下有掳掠者，判官潘枢入责之，愈急下令禁止，搜军中所得子女，悉还之。徐达克元都，市不易肆，尤见威令之肃。”而在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的性情大变，杀戮大臣毫不手软，赵翼认为此前的不杀是“盖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其后胡、蓝二党，诛戮至四、五万人，则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又平定滇、黔，杀苗蛮亦不下六、七万，则以番夷之性但知畏威，非此不足以惩创。”^①天下未定时，则以不杀人获得仁义之声誉，以帮助自己平定天下；天下已定后，则杀戮功臣以减除威胁，稳固自己的皇位。朱元璋的不杀与杀，实际上是由其环境、形势和地位所决定的。

为了稳固自己的皇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明朝刚建立之初，官僚机构仍然采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在地方设行中书省。这样，从中央来说，大部分的权力掌握在丞相手中，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总览军政事务。朱元璋很快便注意到，丞相权力的过大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

^①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二，第837—838页。